

## “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探析

왕페이\*

### 【目 录】

1. 绪论
2. “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类型
  - 1) 士人向商人阶层的渗透
  - 2) 商人对士人阶层的攀附
3. “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特征
  - 1) 温文儒雅的言谈举止
  - 2) 以义取利的商道精神
  - 3) 慎思笃行的经营智慧
4. 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社会根源及其现实意义
  - 1) 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塑造的社会根源
  - 2) 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5. 结论

### 【摘要】

在明代士商关系密切，士商对流的新社会背景下，作为明代社会生活真实写照的代表作“三言二拍”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士商阶层对立的角色设计范式，在作品中塑造了士商互融的新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设计是当时社会士商对流现象的真实反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既有别于一般的士人，也与普通的商人有所不同，在他们的人生中都同时经历了求仕和经商的选择，在言谈举止、商道精神和经营智慧等方面都具有与当时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一般商人形象所不同的特征。明末社会尊儒敬仕同时又重视商品经济的双重社会特征则是作者设计该人物形象的社会根源，该人物形象在当时现实社会的舞台上也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言二拍；士人；商人；互融；人物形象。

\* 인덕대학교 중국어과 교수 (feifei1122@naver.com)

## 1. 绪论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话本小说的杰出代表，是明代社会生活真实而生动的写照，在作品中刻画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在各类人物形象中，商人是“三言二拍”中刻画的一个尤为引人关注的形象生动的群体。在历史上，社会阶层的等级秩序是“士农工商”，商人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作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在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思想形态转变的背景下，逐渐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并成为各类文学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

在“三言二拍”中商人作为一种文学形象以多种形态参与了故事情节的构建，既有成为故事叙事焦点，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角，也有铺垫故事情节发展，着墨不多的配角，既包括家财万贯的巨商富贾，也包括辛苦谋生的市井商人；他们诚实守信、仗义疏财、能谋善断、重情重义，同时又阴险狡诈、吝啬贪婪、见利忘义、薄情寡义，作者从正反两面塑造了这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形象群体。然而除了对传统商人形象的塑造，在明代士商互渗新的社会背景下，“三言二拍”依照当时社会舞台上出现的“士”的商化与“商”的士化现象，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士商阶层对立的角色设计范式，在作品中塑造了士商互融的新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既有别于一般的士人，也与普通的商人有所不同，在他们的人生中都同时经历了求仕和经商的选择，或是准备科考的士子和已经成功踏上仕途的士人，由于种种原因放弃科考或做官，转而走上经商之路；或是兼商从仕，从仕做官的同时兼从商贾事业、另有部分商人家庭出身的士子科举及第后为家族的商贾事业锦上添花、相反还有一部分出身贫寒但才学过人的年轻秀才，入赘富商家庭为婿，受到商人资助成功进入仕途；或是受到传统功名思想的影响，一部分经商后在物质上大富大贵的商人希望通过捐官进仕光宗耀祖，但大多并未放弃经商事业。在明代仕贾兼济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三言二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具有士商互融特征的文学形象。虽然很多学者对“三言二拍”中商人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对特定地区商人如徽商晋商的研究，如朱全福的〈谈“三言”、“二拍”中的徽州商人形象〉<sup>1)</sup>，张实龙的〈甬商、徽商、晋商价值观比较〉<sup>2)</sup>；也有对“儒商”形象的研究，如李志琴的〈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儒商精神〉<sup>3)</sup>，还有对士商关系的研究，如朱全福〈士与商贾结了缘——论《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士商关系〉<sup>4)</sup>，马小溪的硕士论文《晚明小说

1) 朱全福，《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苏州科技学院，2008.08，pp. 56-60.

2) 张实龙，《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23卷第2期，浙江万里学院，2010.03，pp. 22-26.

3) 李志琴，《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32卷第11期，韶关学院，2011.11，pp. 38-41.

4) 朱全福，《铁道师院学报》，第14卷第2期，苏州铁道师范学院，1997.04，pp. 38-43.

中的士商关系研究》<sup>5)</sup>等。但这些研究对充分体现士商互融特征的仕贾兼济这一人物形象的阐释都比较笼统，或将其归纳到一般商人群体进行研究，未能解读出这一人物形象特有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具体分析这一具有士商互融特征的人物形象在言谈举止、商道精神和经营智慧等方面与当时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一般商人形象的不同之处，解读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并探讨明末社会尊儒敬仕同时又重视商品经济的双重社会特征是作者设计该人物形象的根源，并以此折射出该群体的出现对当时社会的现实意义。

## 2. “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类型

“三言二拍”的作者在较多作品中塑造了士商互融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真实地反映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社会的一些时代变化，它打破了传统社会文学作品角色规范中居于“四民之首”的“士”与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之间森严的阶级壁垒，“士不中则商，商而优则士”<sup>6)</sup>，表现出士商两个阶层的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即从仕兼贾和由商入仕。

### 1) 士人向商人阶层的渗透

宋元以后中国的社会大舞台上从仕兼贾的角色随处可见，明代以后更是“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sup>7)</sup>，士人营商成为普遍现象。“三言二拍”作为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自然会记录下这一社会角色的扮演情景，作品中出现了众多备考科举的士子或金榜题名已成功进入仕途的士人，在这些士人中有一部分主要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无法继续备考或者无奈放弃仕途，因此往往选择通过经商来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在物质富足后或是重新参加科考进入仕途，或是完全放弃仕途，专心从商。如《喻世明言》<sup>8)</sup>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中的吴保安，“见任东川遂州方义尉”，家境清寒，因曾得到行军判官郭仲翔的帮助，当其深处险境时，虽素未谋面，吴保安却倾家所有，外出经商，积攒绢布，并偶遇好心官人相助，赎救郭仲翔，到京升补嘉州彭山丞之职。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复，“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便想“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贍家之资”。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汪孚，“曾登乡荐，有财有势”，其嫡亲兄弟汪革也是个文武全才，因与哥哥赌气而离家，“卖炭买铁，就起个铁冶。铸成铁器，出市发卖”，“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警世通言》<sup>9)</sup>卷二十〈计押番金鳊产祸〉中的官人计

5) 马小溪，《晚明小说中的士商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05。

6) 邹状云，〈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求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2011.08，pp.185-187。

7) 黄省曾，《吴风录》，收录《吴中小志丛刊》，杨循吉著，广陵书社，2004。

8) 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华书局，2014。

安，时遇乱世，流落他乡当差，自念“我下番无事，若不做些营生，恐坐吃山空，须得些个道业，来相助方好”，便开了一个酒店以贴补家用。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的乐美善，“原是贤福坊安平巷内出身，祖上七辈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钱塘门外居住，开个杂色货铺子”。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施济，聪明好学，从小在乡学读书，赶赴科场却屡试不捷，只得继承家业。《醒世恒言》<sup>10)</sup>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齐，“随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时疫，数日之内，父母俱丧，无力扶柩还乡”，被富商刘德夫妇收留，继承刘德家业，勤苦经营，使家业愈发兴隆。《初刻拍案惊奇》<sup>11)</sup>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中的文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精通”，“自持才能，坐山吃空”，“以后晓得家业有限，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潘甲，“虽是人物也有几分像样，已自弃儒为商”。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中的刘东山，“在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年三十馀，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告脱了，在本县去别寻生理”。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图圉捷报旗铃〉中的张幼谦，“是衣冠宦族，只是家道不足”，与富商罗家联姻，“上春官，一举登第，仕至别驾”。《二刻拍案惊奇》<sup>12)</sup>卷二十一〈许蔡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中的王禄，“祖是个贡途知县，致仕在家”，王禄幼年读书“废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擷草药巧谐真偶〉中的马少卿，出本钱令家人开了一个“歇客商的大店”。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徽州商人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弃儒与兄外出经商。这些角色都是由习儒而改为经商的，但在完成其自身由士到商的角色转变后作者往往设计他们在营商过程中并不像一般商人那样唯利是图，而是以其文士的儒雅和智慧在商场中获得成功。

## 2) 商人对士人阶层的攀附

明末商人业儒之风也同样剧烈，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大批商贾富户或其子弟通过各种渠道加入到士子官僚的行列。商人或是在经商的同时兼习儒业、或是在经商致富后转而归儒，或是自身事贾求财，而非常重视教子业儒进士，更有为了荣耀用金钱买官者。商人的这种角色转换在“三言二拍”中也得到了反映。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赵昂，“虽然是纳粟相公，家道已在消乏一边”，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施济，聪明好学，从小在乡学读书，赶赴科场却屡试不捷，只得继承家业。卷三十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曹可

9) 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14。

10) 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14。

11)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14。

12)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14。

成,“人材出众,百事伶俐”,“又且自小纳粟入监,出外都称相公”。《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钱青,“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家世书香,产微业薄,不幸父母早丧,愈加零替”,后被富商高赞入赘为婿,供给读书,一举成名。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张廷秀、张文秀兄弟,父亲张权开木工店,“生意顺溜,颇颇得过”,从小便教兄弟二人读书,两兄弟虽勤苦读书,但时逢荒年,只得放弃科考,随父亲经营生意。后分别得到礼部官长劭承恩和商人褚卫的帮助,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官至八座之位,至今子孙科甲不断”。文中还提到富豪王员外的女婿赵昂,原是旧家子弟,父母双亡,王员外将其“赘入为婿,又与他纳粟入监,指望读书成器”。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宽、徐宏兄弟,在老仆人阿寄的帮助下家私巨富,阿寄见“田产广多,差役繁重,与徐宽弟兄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绍兴人胡悦,“因武昌太守是他的亲戚,特来打抽丰,倒也作成寻觅了一大注钱财”,并思量进京买个“三考吏名色”。《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艚〉中的郭七郎,“家资巨万,产业广延”,却认为只要是做过了一番官“那荣耀是落得的”,纳了五千缗得了个刺史。商人在拥有财富后会产生附庸风雅,向士人角色靠拢的倾向,但鉴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士商阶层之间仍然存在着基本的界线,商人将金钱化为权利的机会相当有限,因此商人始终无法彻底完成由商入仕的角色转变。

明代社会较之前代更为浓重的重商风气,致使物质财富成为巨大的诱惑足以吸引士人弃儒从商,作为坚固的后盾鼓励商人由商入儒,加速了士商对流。“三言二拍”作者对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反映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社会的时代变化,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新型士商关系的独特认识。

### 3. “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特征

宋元开始商人从文学作品中的配角一跃成为主角之一,而明代文学则取得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在表现商人方面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但纵观历代文人笔下的一般商人形象多具有重利轻义、穷奢极侈的特征,而“三言二拍”中所塑造的士商互融人物形象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一般商人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作为士商对流社会特征的真实写照,他们在经商过程中集士的儒雅与商的精明于一身,在言谈举止、商道精神和经营智慧等方面都展现出新的角色特征。

#### 1) 温文儒雅的言谈举止

“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角色皆有过事儒的经历,大多文化修养较高,作者在塑造此人物形象

时往往将他们的外貌刻画得清秀白净、温文儒雅，言谈举止文质彬彬、谦逊有礼，更接近士子的形象。作者的这种人物形象设计也反映出商人通过习儒提高文化素养后，在外貌举止方面自然地向士人靠拢的倾向。如《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复，“衣冠济楚”，“至诚老实，待人一团和气”。《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的曹可成“人材出众，百事伶俐”。《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钱青“饱读诗书，广知古今，更兼一表人才”。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奇“为人温柔俊雅，礼貌甚恭”。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士商张孝基“生得相貌魁梧，人物济楚，深通古今，广读诗书”，与妻子相敬如宾，敬重长辈，“且又为人谦后，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上下之人，无不悦服”，处理疑难事体“条分缕析，井井有方”。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张廷秀、张文秀兄弟二人“都生得眉目疏秀，人物轩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弃儒从商的文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潘甲“人物也有几分像样”等等。“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这一特征还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士商对流虽使商人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对商人的评价仍以士人作为标准，判断商人是否为良贾首先要具备士子儒行的外貌言行，商人向往文人儒士的文化情操。同时温文儒雅的言谈举止为作者塑造该人物形象在商业活动中遵守商道精神，运用经营智慧获得成功做了很好的铺垫。

## 2) 以义取利的商道精神

“三言二拍”中的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在士与商互相融合的过程中颠覆了传统商人重利轻义、悭吝刻薄的固有形象，兼具儒士重义和商人求利的两种特征，同时又能摒弃士人一味清高的迂腐思想以及商人金钱至上的重利思想，在商业活动中能够遵循以义取利的商道精神。为了谋求经济地位的改善而向商人阶层渗透的士人受当时义利统一思想的影响，不再耻于言利，承认在义的规范下以求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是一种正当的谋生之道。而为了谋求政治地位的改善向士人阶层渗透的商人因习儒而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认识到在商业活动中追求利益固然重要，但遵守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才是商道的精髓。

“三言二拍”中作者对士商互融人物形象以义取利特征的设计，就体现为其在经商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重情重义、和气待人以及诚信为本的特征。《喻世明言》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中的吴保安为积绢赎回虽素未谋面却有举荐之恩的郭仲翔，“倾家所有，估计来止直得绢二百匹。遂撇了妻儿，欲出外为商”，“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吴保安辛苦经商并不是为了趋利，而是完全为了情义。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复不仅“志诚老实，待人一团和气”，在被倭寇扣留时，宁冒生命危险也要回到祖国，“宁作故乡之鬼，不愿为夷国之人”，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之情。《警世通言》卷二十五

《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施济，见数年未见的儿时友人被债务所逼，便将三百两银子相赠，并说道：“我与君交虽不深，然幼年曾有同窗之雅。每见吴下风俗恶薄，见朋友患难，虚言抚慰，曾无一毫实惠之加。”后又收留其全家，将家业分其管理。在面对义与利时，能够毅然舍利取义，是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于很多士人来说，他们的“弃儒”，放弃的仅仅是对举业的追求，而传统的儒学思想、儒学观念依然深植于他们内心，无法舍弃。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自然会将其带入其中，从而给人一种重情重义、诚信不欺、贾而好儒的崭新形象。<sup>13)</sup>而且作者往往会设计因遵循商道而为其带来更多财富的故事情节，正所谓和气生财、生财有道。《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奇开布店讲诚信，“四方过往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正是因为以诚信为本，家业渐盛，“至今子孙蕃盛，遂为巨族”。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张孝基为人处事一团和气，“夫妻相待，犹如宾客”，敬重父母，再三推辞丈人家产，将丈人过善“所遗家产钱财米谷，一一登记账簿”，十分善于管理，“家事比过善手内，又增几倍”，待过善之子痛改前非将全部财产交与其子，不贪分毫，后使得全家和睦相处，“子孙繁盛，世为姻戚云”。《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中的文若虚待人亲切，“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才得到了去海外经商获利的机会，且在经商过程中不贪图利益，讲究和气生财，获利后不忘当初帮忙的商人们，“按照人数，各分一股”，并在众人埋怨他要价太低时说道：“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亦表现出他讲求信誉，信守承若的优秀品质。作者通过塑造这些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希望能够向读者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当时的社会中利与义紧密相联而不再是相互对立，无论是士人还是商人只有以义取利才能获得更大的财富，改善士人的经济地位，为商人向士人阶层渗透提供强大的经济后盾。

### 3) 慎思笃行的经营智慧

“三言二拍”中的士商互融人物形象还具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营有道，在士商对流的过程中，习儒使其具有较高大文化素养，眼界开阔，能将自身的文化知识运用到商业活动之中，超越传统商人驱逐利益、眼界狭隘的局限；同时又能摆脱文人迂腐顽固、清高自大的束缚，具有商人吃苦耐劳、勤恳敬业的精神。在经营活动中运用智慧、善于变通，讲究商道，经营得法，这些特质都是士商互融角色设计对传统士人和商人的突破，也是其往往能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的重要条件。

《喻世明言》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汪信之眼光独到，经商途中看到一片荒山，“绝无人居，山上都是炭材”，随即想到“此处若起个铁冶，炭又方便，足可擅一方之利”，而且善于

13) 李志琴，〈简析“三言”“二拍”中的“弃儒就贾”现象〉，《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科技学院，2012.05，pp. 129-131。

用人和管理,“在外纠合无籍之徒,因山作炭,卖炭买铁,就起个铁冶。铸成铁器,出市发卖。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无不钦服。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汪信之不仅目光长远,而且知人善用,这自然与其自幼读书,是个文武全才是分不开的。《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张孝基的岳父过善是个家财万贯的富商,见他为人谦厚,“爱之如子,凡有疑难事体,拖他支理,看其材干。孝基条分理析,井井有方。”岳父去世后,将全部财产交其管理,张孝基“将丈人所遗家产钱财米谷,一一登记账簿”,经营有方并扩展家业,在“门首添个解当铺儿”,并任用专门人才进行管理,“家事比过善手内,又增几倍”。正是张孝基“深通古今,广读诗书”的学识让他能在经商活动中井然有序、知人善用,最后获得了成功。《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中的文若虚具有精明的经营智慧,利用名人效益将所卖扇子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的等级,根据等级制定价格获取不同的利润。“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能够针对不同顾客的需要,制作不同等级的扇子,并制定不同的价格获取利润,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经营思想,这种经营思想与其从小习儒,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许蔡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中的王禄“废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王禄在经营盐业的过程中,“眼明手快,算计过人,撞着时运又顺利,做去就是便宜的,得利甚多”。王禄的成功除了取决于他在经商上的天赋外,也与他幼年读书是不无关系的。这些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兼具士的学识与商的精明,将二者融合在经营活动中,以诚信为本、经营有道,自然更容易获得成功。

#### 4. 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社会根源及其现实意义

“三言二拍”中作者设计士商互融角色与作品出现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商品经济发展和思潮倾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中叶起,商品经济在全社会普遍蔓延,不但商人、商业的经济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在社会关系领域,士商融合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嘉靖时人归有光曾云“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虽士大夫之家,皆以蓄贾游于四方……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sup>14)</sup>汪道昆亦言“大江以南,新都

14)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319。



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閤儒，则其躬行彰彰矣。”<sup>15)</sup>可见，商人之家习儒，士人之家服贾，士商共存兼得的情形在其时徽州社会已不罕见。<sup>16)</sup>在商人之子可以读书入仕，读书人或其子弟也可弃儒经商的社会上，士商之间出现了角色转变现象，当时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这现象进行了反映。虽在前代各类文学作品中偶尔出现过士商互融的文学形象，但随着明代士商关系的密切，明代文学特别是作为明代社会生活真实写照的话本小说对士人经商、商人入仕这种士商之间对流现象的描写更为频繁，设计角色士商互融的特征更加突出。

### 1) 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塑造的社会根源

首先对于士人兼事贾业或径自弃学经商与商人阶层融合的原因，余英时先生的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第一是中国的人口自明初到18世纪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未相应增加，因此科举考试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另外一方面，自16世纪以后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对许多士子也构成很大的诱惑。”<sup>17)</sup>从明代开始，由于新的科举制度的确立，造就了一个生员阶层，成为士人阶层的最底层。由于生员人数一直在增加，但举人、进士的名额却很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生员获得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甚至一生也不能取得功名。但另一方面，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经商成功的比率却相当之高，“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sup>18)</sup>。因此很多科场失意的士子便自愿或被迫走上了弃儒从商之路。纵观“三言二拍”士商互融人物形象中士人向商人阶层渗透的直接原因便是谋取经济地位的改善。如《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的范巨卿“世本商贾”“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算是从商入仕，“幼亡父母，屈在商贾。经书虽则留心，奈为妻子所累。”为生计所累范巨卿虽有心应举，但却不得不弃儒委身于商业。又如卷十八〈杨八老越南国奇逢〉中的杨复“祖上原在闽、广为商”，原是商人子弟，虽望读书入仕，但读书不就，“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可见杨复弃儒从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家事日渐消乏”，不得不通过经商获利“以为赡家之资”。这些士人虽都有心习儒，但面临仕途艰难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压力，除了仕途之外他们无法获得更为广阔而合理的生存空间，在陷入生存危机时，不得不冲破士人安贫乐道的传统角色规范的束缚，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弃儒从商，进行向世俗化生活模式的转变。

还有一些世家子弟，因为家道消乏，无力供养其读书，而断了入仕之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不得不弃儒从商的。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的乐美善“祖上七辈衣冠，近

15) 汪道昆，《太函集》卷5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 415。

16) 常文相，〈从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东岳论丛》，第37卷第11期，山东社会科学院，2016.07，p. 33。

17) 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沈志佳 编，《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 156。

18) 吴吉祜，《丰南志》卷6〈百岁翁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p. 378。

因家道消乏，移在钱塘门外居住，开个杂色货铺子”。《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奇“随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时疫，数日之内，父母俱丧”，“我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不幸先人弃后，无心于此”。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货〉中的士商刘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提到世家子弟潘甲也是因此而从商的“那屯溪潘氏虽是个旧姓人家，却是个破落户，家道艰难”，“潘甲虽是人物也有几分像样，已自弃儒为商”。从上述这些弃儒从商人物形象来看，虽说他们在从商的当时大部分是因为仕途成功的希望渺茫，而又往往迫于谋生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他们做出了从商的选择后，生活却大多获得了改善，甚至子孙后代大富大贵。“三言二拍”作者对这人物形象美好结局的安排证明在明代社会弃儒从商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退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积极的进取，这也与当时重视物质享受的时代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士子在走上仕途进入统治阶级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投身商业活动，这与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进步思想家反对重义轻利的思想教条，倡导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变化为士人改变贱商观念，投身商业活动提供了思想背景，而其内在的思想动机则是通过经济保障来维护自身的尊严。在“三言二拍”中就有此类人物形象，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撮草药巧谐真偶〉中一蒋姓客商“一日置货到汉阳马口地方，下在一个店家，姓马，叫得马月溪店。那个马月溪是本处马少卿家里的人，领着主人本钱，开着这个歇客商的大店”。士人从商除上述原因外，最值得关注的是明代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通过经商成为巨商富贾已经远远大于科举进士对人们的吸引力，这就促使一些士子自主放弃仕途加入商海。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正德初年，与兄程采将了数千金，到辽阳地方为商，贩卖人参、松子、貂皮、东珠之类。”明代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生活水平，商人渐渐居于经济生活的上层，与此相比，士人阶层却相对贫困化，且科举成功的希望日趋渺茫，家境窘迫或科举受挫或单纯希望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促使士人纷纷从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认为当时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士人改变传统贱商心理，商业活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得到肯定，商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被受到认可。

其次“三言二拍”中塑造由商入仕人物形象的社会根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个别商人源于兴趣爱好和精神追求，经商固然能赚钱赢利，但在经商之余，忙碌之暇，难免会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与匮乏，于是便以读书作文、吟诗作画等文化活动为乐趣，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寻求内心世界的充实。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士商朱买臣“家贫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门，每日买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卖钱度日。性好读书，手不释卷，肩上虽挑却柴担，手里兀自捧着书本，朗诵咀嚼，且歌且行。”

商人业儒第二个原因便是处于自卑心理希望通过业儒入仕光宗耀祖。明中期后商人的地位虽已

有很大的提高，同仍免不了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受到歧视，商人们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内心深处隐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因此或是读书业儒或是花钱买官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地位，跻身士绅阶层。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扬州府城外的曹家庄，“庄上曹太公是个大户之家。院君已故，止生一位小官人，名曹可成”，“自小纳粟入监，出外都称相公”。《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王宪“积祖豪富，家中有几十王家私。传到他手里，却又开起一个玉器铺儿，愈加饶裕。”家境如此富饶，但当他见到张廷秀聪明勤谨，却说“若我得了这样一个儿子，就请个先生教他读书，怕不是联科及第，光耀祖宗”。虽已大富大贵，但却仍认为只有联科及第才能够光耀祖宗，这是当时商人阶层极具代表性的意识观念。《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中郭七郎的一段话极为生动地表现了商人的这种心理“小弟家里有的是钱，没的是官。况且身边现有钱财总是不便带得到家。何不于此处用了些，博得个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赚得钱时，小弟家里原不希罕这钱的。就是不做得兴时，也只是做过了一番官了。登时住了手，那荣耀是落得的。”

中国封建社会里，士人阶层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而商人要想得到政治保障跻身士绅阶层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商人入仕最根本的原因。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老仆人阿寄在帮主人经商获利后，置下许多田产。“他又见田产广多，差役繁重，与徐宽弟兄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商人赚钱获利成为富商巨贾，取得了经济上的优势，但其仍仍在士人阶层之下，无法获得只有绅士阶层才能得到的各种特权。且得到政治特权后，这种特权还可以为其经商提供极大的便利和政治保护伞。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言：“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sup>19)</sup>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权利统治财产的社会，可以由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并为其经济利益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商人阶层即使富可敌国，最终也终究要受制于权利，受到政治权利的威胁。

## 2) 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三言二拍”中所塑造的士商互融人物形象是对当时社会士商对流现象的真实反映，这一人物形象在社会舞台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随着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士商互融群体的出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商互融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商人与士人阶层的对立，对封建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条造成了冲击，出现了能够正视追求利益的行为，提倡义利统一的进步思想，解除了对人们天性的禁锢，商业意识遍布全社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清除了思想和观念上的障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19)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 112。

其次士商互融群体的出现提高了商人阶层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无论是士人经商,还是商人入仕的士商互融角色都有过读书业儒的经历,掌握一定的知识文化,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经商活动中,对于当时社会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商人培养正确的商道精神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前所述,从经营技巧方面来看,士商互融群体能够学以致用,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知识水平往往使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眼界开阔、精明变通,运用有效的经营手段,较一般商人更容易取得成功;从商业道德方面来看,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使其在经营活动中能够以义取利,善待他人,遵循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将儒家伦理观念化作自己的经营原则,处处表现出儒雅之风,树立了良好的儒商形象。这种良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唯利是图、狡猾奸诈传统形象的偏见,提高了商人阶层的自信,从而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商人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商人自身也参与了商人伦理和商业文化的构造,使商人意识和商业精神浸透其中。<sup>20)</sup>虽然由于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和传统伦理的参照,明末“商业文化又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和伦理色彩。从文化形态上来说,商人文化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熔铸和改造。”<sup>21)</sup>但商人意识的浸透仍为明末商业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士商互融群体的出现为明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商业文化形成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从另一角度也可发现促成士商互融群体形成的这种士商对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商人阶层成长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商人们通过经商赚取利润,经济上获得成功便希望走上科举进士之路,而且商业经营越是成功越为事儒进士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由经商到为官,形成了商人士大夫化的倾向,不能独立表现商人阶层自身的利益,而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难以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sup>22)</sup>

## 5. 结论

“三言二拍”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各种画面,所谓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其中各类商人角色的设计及其对其日常生活的表现极其频繁丰富。在作者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中,富有时代特征的士商互融形象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个人物形象群体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衍生出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说由商入仕的人物形象在前代的文化作品中也偶尔出现过,但从仕经商的人物形象却是在明代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士商关系进一步密切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三言二拍”中所塑造的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可分为从仕兼贾和由商入仕两种类型,这两种人物形象类型是当时社会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互相融合的写照,无论是士人向商人阶层的渗透,还是商人向士人阶层的攀附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

20) 将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995.01,p.123。

21)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p.199。

22) 将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995.01,p.124。

源。

首先士人从商的直接原因便是谋取经济条件的改善，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生活水平，商人的经济地位逐渐提高，与其相比士人阶层却相对贫困化，甚至无法继续习儒之路，不得已纷纷经商事贾，以改善经济状况。同时仕途的艰难是促使士人从商的另一个直接原因。由于当时新的科举制度导致绝大多备考的士子不能取得功名，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经商成功的比率却相当之高，这样许多考场失意的士子，便自愿或被迫走上了“弃儒从商”之路，这成了明代重要的社会现象。<sup>23)</sup>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本则是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致使商业活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得到肯定，为士人改变传统贱商心理，投身商业活动提供了思想背景。

其次商人入仕角色的类型有在经商的同时兼习儒业，或在经商致富后转而业儒，或是自身经商求财，而培养子弟业儒进士。这些商人入仕的原因有的是源于个人对读书作文的兴趣爱好，以此来实现其精神追求；有的是出于商人的自卑心理，希望通过业儒进士改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士人阶层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而读书业儒是商人阶层跻身士人阶层，获得这种特权的重要途径。

“三言二拍”中所塑造的这一士商互融人物形象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上也具有现实的现实意义。士商互融群体的出现对当时的社会及商品经济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在经商过程中学以致用，这就提高了商人的经营技巧，同时也提高了商人的道德修养，改变传统商人的形象，树立起儒商的良好形象；商人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其能够参与商人伦理和商业文化的构造，将商人意识渗透到其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士商互融群体的出现虽然代表士商关系更加密切，但反而说明商人阶层始终无法摆脱政治力量的操作，对商人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成长造成阻碍。从对“三言二拍”中士商互融人物形象的分析来看，士人经商的人物形象远比商人入仕的人物形象要多，这也说明作者仍认为由商入儒是走上坡路的表现，会比较艰难，而弃儒从商则是走下坡路的表现，会比较容易。证明“明代的社会结构和中国其他时代一样，其统治阶层的大门只对士人阶层开放，而不会对商人阶层开放。尽管有时似乎露出希望，可以把金钱转化为权利，但是其机会相当罕见，其位置亦相当有限。<sup>24)</sup>明中期后商人力量的壮大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为新生关系的萌芽和成长提供了契机，但商人的士大夫倾向大大削弱了这种进步作用，士与商的融合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士商之间的鸿沟。

23)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p. 376。

24) 邵毅平，前揭，p. 399。

### 【参考文献】

- 冯梦龙,《喻世名言》,中华书局,2014。
- \_\_\_\_\_,《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14。
- \_\_\_\_\_,《醒世恒言》,中华书局,2014。
-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14。
- \_\_\_\_\_,《二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14。
- 杨循吉,《吴中小志丛刊》,广陵书社,2004。
-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p. 319。
-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p. 415。
- 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p. 156。
- 吴吉祜,《丰南志》卷6〈百岁翁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p. 378。
-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p. 112。
-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p. 199。
-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pp. 376, p. 399。
- 朱全福,〈士与商贾结了缘——论《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士商关系〉,《铁道师院学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1997. 04, pp. 38-43。
- 朱全福,〈谈“三言”、“二拍”中的徽州商人形象〉,《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08, pp. 56-60。
- 李志琴,〈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儒商精神〉,《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韶关学院,2011. 11, pp. 38-41。
- 李志琴,〈简析“三言”“二拍”中的“弃儒就贾”现象〉,《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科技学院,2012. 05, pp. 129-131。
- 张实龙,〈甬商、徽商、晋商价值观比较〉,《浙江万里学院学报》,浙江万里学院,2010. 03, pp. 22-26。
- 常文相,〈从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院,2016. 07, pp. 31-39。
- 将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995. 01, pp. 123-124。
- 邹状云,〈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求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2011. 08, pp. 185-187。
- 马小溪,《晚明小说中的士商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05。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三言二拍, 士人, 商人, 互融, 角色				
	영문	Sanyan and Erpai, litellectuals, Business people, Mutual infiltration, Character Image				
<div><div>The Study on the Infiltrating Character image of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 People in the “Sanyan and Erpai”</div><div>Wang, Fei</div><div>Under the new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an in the Ming Dynasty, “Sanyan and Erpai” broke the role design paradigm of opposi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an and shaped it in the works the new rol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an. The design of this role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convection phenomenon of social scholars and merchants at that time, and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intellectuals and ordinary businessmen, they have all experienced the choice of seeking official positions and doing busines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lives. They have the same skills in terms of mannerism, business spirit, and management wisdom.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l merchant roles portrayed in literary wor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du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and respecting officials at the same tim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mmodity economy we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author's design of this role. This role was also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stage of the real society at that time.</div></div>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왕페이 / 王飛 / Wang, Fei				
	소 속	仁德大学 中文系				
	Em@il	feifei1122@naver.com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0.11.19	심 사 일	2020.11.30	게재확정일	2020.12.16